



涅槃变相碑上的“佛陀双树涅槃”画面

山西古建筑博物馆(太原纯阳宫)的碑廊中收藏有一件国宝级文物——武周天授二年(691)涅槃变相碑。该碑高302厘米,宽87厘米,厚25厘米,体量沉稳,螭首圭额,通体磨光,碑身没有长篇累牍的铭文,以九幅连环浮雕呈现跨越生死的宏大佛教图景。它从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征集,并于2002年入选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目录,也是著名的纯阳宫“三绝”(常阳天尊像、九宫八卦院、涅槃变相碑)之一。这通石碑不仅是盛唐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,更是一块凝固了武周革命政治密码的“石头诏书”,蕴含丰富的宗教、政治寓意。

此碑在形制上摒弃了北朝造像碑常见的千佛龕像模式,采用了极具皇家气派的螭首龟趺制式,特别是碑阳与碑阴的圭首设计,构成了完整的佛教宇宙观。

碑阳碑额浮雕出须弥山的图形。须弥山作为佛教宇宙论的中心,象征着佛国净土与天界,暗示着释迦牟尼并非肉身消亡,而是回归至高法界。碑阴碑额则对应雕出一座方形单檐攒尖顶的舍利塔。塔是涅槃后供养舍利的圣物,这一设计将叙事视角从“佛的寂灭”引向“法的流传”。

碑身中央,刻有一行楷书题记“大周大云寺奉为圣神皇帝敬造涅槃变相碑一区”。这短短二十字,将特定的时间(大周天授二年)、地点(大云寺)、政治核心(圣神皇帝武则天)与宗教行为(造像)紧密捆绑,使其具有了珍贵的史料价值。

此碑在内容上,采用以图像“倒叙”的叙事方式,打破了常规的时间线性逻辑。

碑阳正面的六幅画面,自下而上依次展开。最底层为临终遗诫(纯陀供养),表现释迦接受纯陀的最后供养,从容嘱咐后事。紧接着便是全碑的视觉重心——双树涅槃。娑罗双树下,如来右胁而卧,呈“狮子卧”姿,周围弟子哀戚,罗汉捶胸,菩萨低眉,护法狮吼,飞天旋绕。这种将至尊置于中上部的构图,极大地增强了宗教的崇高感。碑身右侧,自上而下雕琢摩耶哭棺与再生说法。摩耶夫人自忉利天降临,抚棺悲恸,释迦竟从棺槨中挺身而出,为母亲说法。这一情节将人间至情与佛法慈悲完美融合。左侧则自下而上刻画绕城送葬与火焚尸身(荼毗)。送葬队伍如盛唐仪仗般庄重,而火光中的圣棺却寂然不动,暗示色身的幻灭与法身的永存。碑阴的图像则承接了涅槃后的故事。左侧为八王分舍利,描绘了拘尸那城周边八国为争夺舍利兵戎相见,最终均分佛骨的情景,寓意佛法流布四方。右侧则是一铺三佛四菩萨像,弥勒佛居中,释迦牟尼佛与阿弥佛陀佛分列左右,辅以四尊菩萨胁侍。这一布局并非随意为之,而是暗藏了武则天“弥勒下生”的政治神学逻辑。整通碑刻刀法圆润流畅,衣纹行云流水,尽显盛唐气象。

这通碑刻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。公元690年至691年,当时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登基,面临着李唐皇室“君权神授”与儒家“男尊女卑”伦理的双重挑战。她急需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来重构统治合法性。佛教,尤其是弥勒信仰,成为了她最好的工具。武周天授元年(690)九月,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,加尊号“圣神皇帝”。仅仅一个月后,她便下诏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,藏《大云经》,并度僧千人讲经说法。这通涅槃变相碑,正是这一宏大政治运动背景下的产物。值得注意的是碑阴的“三佛四菩萨”像,弥勒居中,正是对“当今圣神皇帝即弥勒佛”这一政治宣言的图像化确认。通过这种视觉传播,深奥的经文变成了老百姓看得懂的石刻连环画,有效地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植入了民众的心中。

涅槃变相碑有无可替代的三重价值。它是政治史的直接物证。碑上“圣神皇帝”的题记,是武则天利用佛教经义构建皇权合法性最直接、最原始的典范之作,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它是艺术史的标尺。该碑代表了唐代造像碑从北朝的“千佛模式”向盛唐“经变连环画模式”转型的成熟形态。九幅画面构图严谨,情节连贯,人物生动,是研究唐代佛教美术构图与雕刻技法的典范之作。它是宗教史的标本。它是目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《大般涅槃经》图像体系单碑,完整展示了从临终说法、双树涅槃、摩耶哭棺、火化分舍利到弥勒信仰的全过程,为研究唐代涅槃变图像学提供了最系统的实物资料。

勒石刻铭,碑载千秋,历史的复杂和宏阔尽聚一石。

馆记

阳曲小五台文昌祠

唐中才

太原市阳曲县系舟山,因元好问父子曾在其北麓寺庙读书,故名读书山;又因地形酷似佛教圣地五台山,又俗称小五台,海拔约1900米。在其北台之巅,矗立着一座简朴的文昌祠。

立祠前放眼四顾,孤峰凌霄,山高风烈,群山苍苍、云海茫茫,山间常年蓬榛葳蕤,鸟兽繁息。祠与周边村落隔绝,并无车马通途,附近乡民,尤其是文昌祠的建造者——阳曲县东峰村人,唯靠徒步翻山越岭,披荆斩棘,需攀登900米高度,行程十余里方可抵达。称之为太原境内最为苍茫荒凉的文昌祠,诚不为过。

文昌祠内主祀文昌帝君。帝君是道教与民间信仰中文运、功名、禄籍的主神,俗称梓潼帝君,是后世文人百姓崇奉斯文、笃守良善的核心神祇。该祠始建年代无详志可考,溯源无载。相传元好问父子曾在此读书,故此地被乡人视为文曲星下凡之处。因此推测该祠始建于元代,是附近邑人数百年来寄托信仰和赓续文脉的一方圣地。

这座文昌祠就地取材,以白云石干荏垒砌而成。干荏垒砌是指垒墙不使用泥浆的建筑形式,多用于山区垒砌石头墙。文昌祠坐东朝西,外观高约3米,长宽各约4米,墙厚约1米。内部形制取“天圆地方”之意,上部为穹隆顶结构,下部为正方形。三根浮雕绳纹石柱,面宽约0.3米,相互构筑为门框,其一作门楣,镌楷书“默佑斯文”,字体端稳圆融;其二左右对称作门洞立柱,浮雕宝瓶缠枝莲花,形成一茎三莲,附带双苞之式的图案。暗含连登三甲、文脉绵延之意。门洞高约1.7米,宽约1米,向内正对二尺许高的神台,旧时神像现已不复存。穹隆顶端封以青石板。板心阴刻八瓣海棠纹样,象征满堂登科;外围以两方交错四十五度叠成八芒星,纹饰寓意深



文昌祠(资料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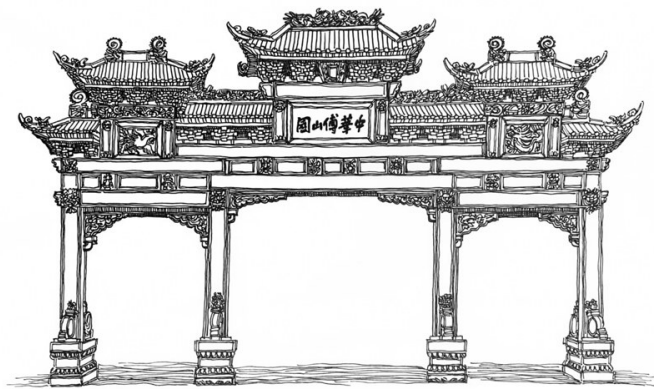
远,乡人相传象征文星交辉,世运昭明。整个纹饰,简洁凝重,承载了邑人崇文重教的殷殷期望。

祠内尚存一通白云石古碑,正面镌刻《重修文昌祠记》,碑阴刊功德名录。幸得石碑移置祠内避护,才免于风雨剥蚀,不致文字漫漶。据碑文所载,该祠复建始于清道光三十年(1850)秋,竣工于“大清咸丰元年(1851)岁次仲春穀旦”,捐款人以东峰村郭姓人氏为主,杂以石岭关村等村少量牛、杜、徐姓村民,捐款数额二百文至六千文不等。主事者以及泥匠石匠铁匠几乎全部为郭姓。碑文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忻州儒学生员宿皓撰写,详述重修缘起、工程始末、乡众善举、立祠初心和主事分工等一应诸事,这座空山野祠自此有了确切可考的文字史料,被赋予明晰的历史坐标。另外,特别说明一下,泥匠就是塑造神像的工匠。碑文所载中存在泥匠石匠铁匠,表明村里有人娴熟这些行业技艺。

这座隐匿于小五台荒巅的文昌祠,至今寂然无闻,尚无文物标识,不为俗世熟知,亦鲜为当地年轻人所晓。然一祠立空山,一碑载岁月,百年前一众乡贤募资鸠工、兴修斯文的赤诚历历可见;先民祈文运昌盛、子弟忠孝、耕读传家、世守良善的朴素心愿,亦藉此石一祠一碑得以长存。

时至今日,无数文史爱好者不辞山高路险,披荆寻迹而来,所奔赴者,不只是山野古建的人文风华,更是这份空山守斯文、荒岭存正气的纯粹精神信仰。

状物



中华傅山园石牌坊

籍云燕 绘

一方碑刻映照武周风云

胡春良